

第一章

《鹞冠子》与统一性的矛盾

在中国哲学这个研究领域里，《鹞冠子》一书给人两种十分突出的感觉，既令人着迷，又令人沮丧。这部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入道家类的著作，对于研究诸如古代中国思想中“元气”概念的演变以及“自然法”等长期存在的问题来说，都引起了人们很大的期望^①。但是它内容的晦涩难懂却常常使得这种兴趣转化为愠怒、冷淡，最终使人们将此书漠然置之。这种种晦涩难懂，再加上其作者是谁在整个历史文献中根本不能得到证实，因此《鹞冠子》便被定成了一部“伪书”。这部著作，就其许多章节的讹误、文笔的“鄙浅”、文字的逐时递增以及内容的混乱而无内在联系等等而言，都遭受了后人的不断批评。李约瑟（Joseph Needham）觉得《鹞冠子》的一些“段落，令人出奇地感兴趣”，但是因其文本的复杂难懂，时代的难以确定，李约瑟也不想去对此书作详细的叙述。李氏的这种含糊而且主要是否定的态度，代表了人们对《鹞冠子》一书的想法。李约瑟说，“这部著作，因为内容相当混杂而极难确定年代……在其年代经过考订而确定之前，任何阐释都只是仓促之说”（李约瑟 1956：547）。

从唐代到清代，学者们几乎一致轻视《鹞冠子》一书，认

为它在学术上价值不大。这种否定的论断，在清代，第一次受到了《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和《鹞冠子》的研究者，比如俞樾、孙诒让以及王闿运等人的挑战^②。但也只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主要由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四种黄老帛书^③手稿的发现，其中内容的表达方式、思想观念、文体风格等，与《鹞冠子》一书都有着特别的相似之处，对《鹞冠子》一书的研究才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不过《鹞冠子》一书在中国，除了张金城写了一本《鹞冠子笺疏》（1975年），浦伟忠作了白话翻译之外（1992年），仍然是一块未被深入研究的领域，迄今，也仍然没有一种任何其他语言的《鹞冠子》全译本出版问世。

我们并不一定要等到最终解决文本的晦涩难懂之后，方才去进行哲学的研究探索。确实如此，从今天来看，除了十几篇多数是用中文撰写的文章之外，一些为数不多的主要的研究工作还是投入了这部著作的文本研究之中^④。结果，在《鹞冠子》的研究者中，他们的学术观点，逐渐从占压倒性多数的否定论断——不论是全盘否定，还是部分否定——转移到了谨慎的肯定立场。和往昔的长期认识不同，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这部著作大部分是较为统一的、连贯的、可信的^⑤。虽然至今尚无一本专著就其内容而写作，但是近来还是有一些论及《鹞冠子》的哲学文章发表问世^⑥。

无论如何，近来一部分学者对《鹞冠子》的整理，并没有形成一般的共识。讨论仍然在两种意见之间进行。因为该书明显的散乱零碎，一些学者对此书加以排斥，另一些学者则在现存零乱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再建其具有统一性的哲学，恢复《鹞冠子》一书的原貌，把它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文本看待。人们因为此书的零乱而普遍地感到不安，但是又都对其统一性寄予了期望。排斥和试图复原该书的两种做法都因以上两种认识

而获得了立论的根据，相较之下，人们对以上两种感受本身却很少给予明确的思考。

1.1 对统一性的期待

正如一位中国作家所说，对知识的任何讨论和断言都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然而这个基础自身却又了不可见（《庄子》 25:71/52-53 葛瑞汉译本 1986: 102）。在《鹑冠子》的研究领域，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对于统一性的期待（the expectation of unity）。学者们曾经将《鹑冠子》作为一本书来对待，因此很自然地会期望它有某一位作者，在某一时间最终表达了一组连贯有序的思想观念。但是因为《鹑冠子》一书使得这些期望落空，所以它引起了一些人将其视作伪书而排斥拒绝，另一些人则试图将它重建，使它成为体面的哲学。这两种反应都是建立在一个对统一性进行论争的复杂的网络之上的。

统一性的探求

如果我们听一场报告演讲或者阅读一本书，我们会期望在其中发现一种统一性：某个人在一段时间，表达了一组统一的或者连贯的思想。如果具有明显的矛盾性，主题或者风格突然发生变化，思路明显的不连贯，那都会促使听者或读者去探寻一个更为基本的统一性。一个作者所作的陈述相互有着联系性，与主题相关联结，或多或少具有趣味，可以理解，这一看法不仅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种心态，甚至可能是一种道德的责任。正如格利斯（H. Grice）所说，在一个特定的文本中，“协同原则”（principle of cooperation）要求读者去寻找统一性^⑦。如果一个同事在工作之时，对一个关于老板的恶评作出反应，

漠然地答道：“今天天气真好”，大家都会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他并不是在给大家提供气象信息。当然，这种假设是基于一种期望而成立的。这种期望是说，有一种联系性存在，它联结了两个明显的没有关系的评论。

阐释一本像《鹞冠子》这样奇特而古老的典籍，对读者发现这种联系性的想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鹞冠子》一书中，尽管有这样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即这部篇幅约为15 000字的著作是发疯似地、草率地抄袭随意得到的一些文献残篇的结果，但是，运用协同原则——这是进行合理阐释的首要条件——则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阅读应该是在一连串对统一的期望或认识的引导下来进行，比如在短语和句子的重建上语法的统一性，在承认《鹞冠子》是篇章或者段落具有关联的组合体上文本的统一性，在作品内核出自一人之手抑或思想相似的众人之手的归属性上作者的统一性等等。

统一的矛盾

按照协同原则去做，无论它显得多么寻常，多么具有道德性，也还是有问题的。统一性在于观察者的认识，因此也绝不会是单一清纯的。统一性是我们赋予文本的而不是仅仅在文本中被发现，所以统一性从来不是一种绝对的给定事实，而是依赖读者所期望的统一性的程度和类型。因此，我们应该有一定的自知之明和宽容性来对待这个协同原则。

期望一个作家表述的思想连贯有序，这是一个难以达到的理想。有多个作者是每一种著作的特征，甚至现代单一的一个作者，为了在论辩中使叙述连贯一致，也都从他人采获思想观念，从史料文献中隐约地引用材料。在叙述中避免前后不一的矛盾和内里的混乱，作者做的是否成功，他或她都有一个接受

批评家和读者判断的问题。一部古代的中国文献，比如《鹞冠子》，作者有多个是非常明显的：著作在一个人的名下流传，通常却是由多个作者写就的论文汇集，而从他人的著作或者共有的文献选用段落的习惯，在古代是规律，并不是什么例外。甚至我们把后来所有对现存的文本做出贡献的作注者、造伪者以及传抄者都考虑在内，《鹞冠子》一书有多个作者也显而易见，和现代所假定的单一作者比较，区别仅仅是程度问题而已^⑧。

但是统一性却不仅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且也属于特殊期望的一种语境的问题。重建或者放弃一种文献，其理由本身就是建立在对统一性的特殊期望上的。面对残存文本的零乱，一个早期的抄写者可能受到修整文体的诱惑，对《鹞冠子》一书做了恢复工作，而今天认可此书的学者，推测原书肯定存在一种前后一贯的系统，尽管仅仅存在于作者的内心，但也是存在，于是便倾向于以哲学的理论或者一组原则来重建其内容。在批评方面，也同样运用了这些方法：因为《鹞冠子》一书内容混乱，文字的递增反常，文体的前后不一以及文本的讹误，所以，批评界对《鹞冠子》一书出于伪造的不断指责，在对该书统一性的失望中，在遵循“清楚”、“正常”、“连贯”以及“真实性”等的特殊标准下而最终出现了。

甚至对这个文本持厌弃和批评态度的评价，也不可避免地求助于某些统一性的标准。描述不统一性的思想活动，其自身也需要求助于统一性。如果一个人因为神志恍惚或心不在焉而语无伦次，在我们说明解释其情况时，无论多么含糊，我们都能用一种新的统一性和一致的条件来加以说明。因此，那些用来反对《鹞冠子》一书真实性的论辩也恰恰一直认为该书具有这种变通性的统一形式。在唐代（后来常常重复进行），《鹞冠

子》一书最早被定性为“伪书”。支持这种描述的论辩一直都在同一个问题上纠缠不休，使出各种解数，比如设想它是一部由浅薄无知的业余作者“有意的虚构”，有时候还指责此书为抄袭，或者将文本解释为一种由注释的篡入，或由至少两种不同的著作混合一起而产生的“无意的伪作”。

对某一特殊的证据以及使该证据具有相关意义的诸多（读者的）期待同时进行反思，会使我们对统一性的要求在不必从根本上排斥协同原则的情况下，显得合情合理。除此之外，《鹞冠子》中先前与几乎所有对统一性的期待背道而驰之处，都可以成为正面的洞见之源。它可能使我们不但注意到，无论如何小心留意，都没有任何阐释是纯然无瑕的这一事实，而且也使我们注意到，在零乱和统一之间，存在着一种难解难分的关联。

1.2 残篇断简的庆典

本书研究现存的《鹞冠子》，集中讨论此书散乱的材料和零碎的哲学思想，是把它放置在中国古典文献的背景下，作为残缺不全然而却十分引人注目的汇集本来看待的。在历史研究领域，对残篇断简作积极欣赏的评价，沃尔德伦（Arthur Waldron）研究长城，这个中国一统的象征，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我们一般认为，长城是不断修建而产生的，初建于某时某刻，有一个特殊的目的。沃尔德伦在研究中，通过追溯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里建造的各段短墙，然后就城墙的功能与效用展开复杂的政治讨论，由此而将这个一统的神话解构为材料、时间和功能的碎片，当然，这种研究也并不否定长城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民族性意义（沃尔德伦，1992）。本文的研究也使

用了这样的方式，当然也不放弃协同原则，在此基础上，尝试为作为断简残编的《鹞冠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提供一席之地。

文本统一性的期望和解释

为了把这堆错综复杂的文本材料分解为若干相对独立的部分进行研讨，本书的第一部分，根据罗浩（Harold Roth）在研究《淮南子》文本的衍变中所厘定的方法，将其分为传记（biographical）、文献（bibliographical）、注释（commentarial）和文本（textual）四类材料而组织起来（罗浩，1992：10）。在这四类材料中，每一类都对统一性含有特殊的期望，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种类的失望，这样，最终导致《鹞冠子》的研究者，选择统一性的适当形式来解释这个复杂的文本。本书第一部分的四个章节，笔者大致按照年代的顺序，评价传统的各种论辩，通过分析研究各种最相关的实例情况，将这种讨论联系在一起。

第二章将讨论两个传统的基本传记材料，这涉及到作者的年代和籍贯问题。有关《鹞冠子》的最早材料始于汉代：这些材料隐秘含混，疑窦丛生，材料来源也仅仅是该书自身而已。但是它证明了从周代即已开始的一种倾向，即人们偏向于在一个单一的名字下，把一些论文作品汇集起来，因此给该书赋予某种统一性。随着有关《鹞冠子》的传记材料不断增加，它们变得更加混乱，这样也引起了人们开始讨论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位作者的问题。讨论的结果最终导致对此书的价值也产生了疑问。传记材料互相矛盾，有一种解决方法是重建作者的一生，将地理的变化也考虑进来。在《鹞冠子》的研究领域，最为流行的解释是认为作者有多个，这样就使得认为只有一个作者的严格要求成了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把文献学材料归类整理，把有关《鹞

冠子》一书最初的文献材料登录存目，这两者都是从汉代才开始的。在皇室和私人收藏的文献简介和目录中，这些材料包括给一部著作所确定的篇幅及其哲学的类别等。就像第三章笔者将要说明的那样，有关《鹖冠子》的文献材料，因为关于《鹖冠子》的篇幅和类别的两方面材料在整个历史上都非常不一致，所以人们更加怀疑这部十九篇的道家文献的真实性。有一种解释说，《鹖冠子》一书可能是多种文本的混合体；另一种解释则假设，可能是这一位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改变了他的哲学类别。

第四章展示了《鹖冠子》的注释材料，主要包括唐代以来的一些评注。这些评注基本上重视文体的连贯一致。在中国的中古时期，文体的连贯一致是作为鉴赏作品的标准而出现的。就《鹖冠子》而言，人们对于连贯一致的期望变得非常强烈，使得文体问题直到本世纪初都一直占据着这种讨论的中心。在一些篇章中，文体差异极大，从而导致了人们指责书中含有抄袭的成分。

本文材料引起关注是在最近才开始的。明清两代逐渐产生的语言学兴趣，连同本世纪的考据学一起，使得学者们开始比较不同版本及更早的一些佚文的异同，以寻求现存所有讹用版本的“底本”。人们近来关注文本的讹误舛错，除了引起对《鹖冠子》一书的指责和忽视之外，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新的解释，即假设文本中篡入了注释的内容。

各种重建中思想的统一性

有些学者在解决了文本中主要的晦涩难懂问题，将文本的疑难段落梳理清楚之后，开始研究《鹖冠子》的内容。往昔习惯的方法一直由于假定《鹖冠子》是一部“哲学”的文本，强

调认为它在传统上与这样的哲学著作有关，因此将它的零散内容重建成为完全形而上的、认识论的和政治的理论。虽然西方哲学家倾向于认为中国的诸子思想过于零散，表述又过于注意修辞，同时也非常世俗化，难以视作名副其实的“哲学”，但是汉学家们还是以最为宽容的方法对待这些文本，常常进行了这样的重建。本书第二部分可以和第一部分分开阅读。这一部分不再作那种西方汉学传统的研究，而是探寻另外一些方法来遵从协同的原则，同时，试图更为积极地解释那些从“哲学的”角度看时，好像仅仅是断片残编的东西。

自从“哲学”和“论辩学”在希腊的土壤上第一次出现之后，它们就被陷入了“争吵”（quarrel）之中。如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所说，根据这种“争吵”，“人们可以写出西方思想史来”。许多历史确实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因为作者的思想系统不同，侧重点肯定也是不一样的（费希，1989：484）。“哲学家们”认为，论辩学是一种偏见的因而也是低级的哲学类型，而“论辩学”的传统则认为，每一种作品文字都是论辩性的，其中也包含传统的哲学^⑨。所以，用“论辩学”的方法研究《鹞冠子》，不可避免地要将其内容看做具有“论辩学”的特征。中国古代几乎完全没有这样的“争论”，在这一前提下，论辩学一词就需要加以限定，以对照其在西方的内涵。这一点，作为一种尝试，在第二部分将进行讨论。

第六章把鹞冠子当做一个论辩学家来谈，当然这并不是意味他加入了“论辩学”的逆流，反对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传统，因为中国那时并没有这样的传统；同时这也不是说，作者在亚里士多德最喜爱的第二种意义上，提供了一种检验人们语言说服力的方法。就第一种和最为熟悉的意义上来说，作者是一个论辩学家，试图坚持一种辩论，为自己辩护，向他人诘

难。像《鹞冠子》这样的一部论著，主要是一种进行说服的活动，并非仅仅是描述现实。因此，我们讨论这部古代论著的内容，是要去重建一般的政治背景。作者最执著的论断和反复出现的埋怨，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出现的。

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来，《鹞冠子》也是论辩学性质的。这就是作者对语言的运用。在“哲学”的阐释中，除了具体的背景之外，我们常常将实际使用的语言形式忽略不计，把它仅仅看做与传达思想内容不相关的方式而已。第七章集中讨论书中的语言问题，主要是使用语词的适当问题，指谓事物的强调问题和定义功能的作用问题等方面。鹞冠子对语言的使用，表明他对语言文字影响政治现实的力量，有一个理解不断深化和发挥其作用的过程。因此在这一章中，讨论《鹞冠子》一书连贯一致的形式，重点是放在其论辩的方式上，展示的内容仅仅用来说明作者使用语言的力量。《鹞冠子》一书并不缺乏“哲学”的准确性，书中许多短小的段落和反复的定义十分丰富，为读者提供了颇有意蕴的政治和道德的洞见。

本书的最后两章，阐释了《鹞冠子》一书中对语言所作的明确的论述，并重构了《鹞冠子》一书的内容。就此而论，它们也是论辩学的；不过笔者所使用的方法，则是直接地集中探究《鹞冠子》一书中，分别就“名谓”的力量及超越名谓的领域所阐述的观念加以讨论。第八章谈论名谓的问题，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处于对语言的说服力作系统阐述的西方范畴和关于语言的哲学理论这二者之间。在这二者中，语言的哲学理论认为现实对语言具有毫无疑问的支配作用。《鹞冠子》中表述的“名谓”观念，从作者在使用语言上逐渐地清楚准确可以看出，是逐渐认识了语言的重要作用的。因此，对前面两个章节中讨论的论辩学主张和论辩方式，第八章作了进一步的揭

示和明确的论证。笔者不像“哲学”刻意要做的那样，认为“名谓”对《鹞冠子》的现实观只有表面的意义，而是认为，在《鹞冠子》一书中，现实通过一系列的“名谓”而显现为“正名”的标准之一。

第九章所展示的超越名谓的领域，不是系统地说明此前未作讨论的所有论题，而是对作者“未名”（unnamed）观的重建。传统上，有一种对“形而上学”领域的诉求，这种诉求在佛教进入中国思想之前似乎尚付之阙如，而鹞冠子对“名而上学”（meta-linguistic）——未名的着迷便因此成为这种诉求的论辩学意义上的对应物了。

近来，“论辩学”的传统再次活跃起来。由于它的影响，积极地评价断简残篇也推动了本书的研究工作。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通过反复考虑《鹞冠子》一书的文本和复杂性以及那种已成为传统评估之基础的对统一性无可厚非的期待，笔者含蓄地使用了论辩学的方法。本书的第二部分将《鹞冠子》的内容作为论辩学文本来阐释，也充实了这一方法。《鹞冠子》的政治背景，其作者的关注点及其具体的表述方法，表明他在语言的使用中隐含着对语言的看法（第六、七章），这种看法又明确地表述在他对语言的力量、局限性和来源这三者的观点中（第八、九章）。选择这个方法研究《鹞冠子》的残编零本，毫无疑问，不是去否认文本的统一性，而是去尝试评价这个观念的内在的复杂性。这个论辩学的方法不否定用“哲学”的方法解读《鹞冠子》的做法，后者声称哲学的方法是“不二法门”，对此笔者当然不能同意。

第一部分

作为一种散乱文本的
《鬲冠子》

第二章

传记材料以及对单一作者的期待

《鹞冠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和地点问题，是作者统一性的两个传统的基础。对于这一点，文本自身保持了沉默。第二点，即鹞冠子的籍贯问题，今天也未见经常讨论。大多数对《鹞冠子》持怀疑态度的人都只是满足于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哲学家生活在中国，如此而已。但是在鹞冠子的时代，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个追问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带回到了第一个问题：鹞冠子生活于何时？

在周朝，中国以夏商两代的后裔和中国文化的摇篮而闻名，她慢慢地与日渐强大的周边国家有了一定的关系。到了秦朝，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官僚体制的帝国。在这样的关键时期，我们将鹞冠子放置到哪里？他来自原初意义上的“中国”还是周边国家？他是生活在秦朝的统一之前还是统一之后？是在汉朝集权制建立之前还是建立之后？当然，鹞冠子会像其他诸子所做的那样，从一个诸侯国迁移到了另一个诸侯国。他的生活可能也经历了几个时期，因而体验了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发展时期朝代的更替变迁。当坚持单一作者的看法时，时间地点的变动，对于解释文本中的不统一，确实是最好的理由了。

在《鹞冠子》中，大部分章节可能是在大动荡时期写就

的。这个时期，变动是每天的议事日程。不但是人民在时间和空间里迁移流动，而且时间和空间，我们不妨这么说，也在众人的脚下变更：整个的社会、政治和地理的世界在一股快速变换的潮流中崩溃瓦解。鹞冠子可能连脚步也没有挪动，就成了既属于赵国也属于楚国的人，因为在秦朝之后的政治间歇时期（公元前 209—公元前 202），赵国一度成为楚国的一部分——项羽所控制的领土。因此，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在二十年的时间里，鹞冠子可能是不少于三个朝代，周朝、秦朝和汉朝的臣民。

对所有这些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鹞冠子都保持了沉默，无一言道及。不管怎么说，文本提供了比其作者可能所希望提供的更多的线索。所有关于作者的现存材料，实际上都是来自文本自身。其中最为明显的暗示后来就成了传记简介和文献目录的内容，而随着近来学术兴趣的增加，也出现了一些更加细密的推测。甚至此书的神秘特征，也已成为研究其作者的年代和籍贯的参考来源。

2.1 传记和文献目录中的籍贯

《鹞冠子》一书最早的统一形式，作者的统一性，我们可以从汉代以来的简介中看到。有一种倾向甚至在周代就已经开始出现，即把一部著作归属于一个人，比如《管子》归属管仲（公元前 7 世纪），《商君书》归属商鞅（死于公元前 338 年）。虽然这种归属并不一定需要强行宣称，说这个历史人物逐字逐句地写就了这些文章，但是合集使用单一的名字，总是给这些文章的汇集提供了某种统一性。

现存有关《鹞冠子》的最早材料是文献目录形式的：班固

(32—92)将《鹞冠子》归属于《汉书·艺文志》的“道家”类名下，对作者鹞冠子加以介绍说，“楚人，居深山，以鹞为冠”（《汉书》，30. 1730）。显而易见，班固将作者的籍贯看做最重要的材料。这一材料，应劭（约140—206年）在他的《风俗通义》中也接受了过来^①。人们将作者当做楚国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根据此书的第九篇“王鈇”，在该篇中，作者使用了柱国和令尹，楚国官衔的两个最高称号。

由刘歆（卒于23年）于公元前6年进呈给汉朝宫廷的《七略》一书，在中古时期即已散佚，现在仅在其他著作中存有一些引文。此一较《汉书》更早的史料也包含一些有关鹞冠子籍贯的材料。这一史料称：“鹞冠子，常居深山，以鹞为冠，故号鹞冠子”（《太平御览》，685. 6a）^②。虽然没有指明地点，但是却提供了两个线索：深山和鹞冠。这两点都倾向于暗指赵国而不是楚国。

说到第一个线索，鹞冠子作为一个隐士居住在深山之中，从作品本身看不清楚所提示的是什么。根据葛瑞汉所说，此书有一个总体的特征，它属于那种“特殊种类的秘籍，以假名写就，以期掩盖其神秘的隐士身份。而某些大人物却从他那儿学到了秘诀”（葛瑞汉：1989. H: 505）。就《鹞冠子》而言，这个“大人物”肯定是赵国的大将庞煖。庞煖在公元前242年打败了燕国的大将剧辛，按年代说来，这是在《鹞冠子》一书中所提及的最近的历史事实。进一步来说，在《鹞冠子》的两篇中，庞煖（也可能是庞煊）^③是赵国国王的师傅，在其他五篇中，也有一个庞子是鹞冠子的弟子。而庞煖又是公元前241年领导最后的抗秦战争的统帅，因此他对秦国的方针政策，肯定抱有一种在《鹞冠子》全书中处处可见的恶感。庞煖是一位名将，也是国王推崇的谋士，如果鹞冠子希望以庞煖的一个无名